

# 博物馆“新”定义被搁置了么 ——基于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5届大会讨论的批判性反思\*

Is the “New” Museum Definition Broken: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New Museum Definition Proposed

文森特·诺斯<sup>1</sup> 史蒂芬·英格斯曼<sup>2</sup> 著 张俊龙<sup>3</sup> 译

Vincent Noce<sup>1</sup> Steven Engelsman<sup>2</sup>, Translated by Zhang Junlong<sup>3</sup>

(1. 《艺术报》编辑部, 伦敦, W1S1BN; 2. 维也纳世界博物馆, 维也纳, 1010; 3.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1. The Art Newspaper, London, W1S1BN; 2. World Museum Vienna, Vienna, 1010;

3.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博物馆是什么? 国际博物馆协会作为博物馆界的权威机构, 给出过答案。从1946年开始, 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收藏机构; 1951年, 博物馆被定义为一种机构, 直到1961年才被定义为永久性机构。亚洲同行于200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首尔大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这次概念讨论经过充分准备, 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博物馆定义的当前版本是2007年在维也纳大会上通过的, 其中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

国际博物馆协会执行董事会于2019年7月22日在巴黎选择了新的定义, 但有24个国家委员会发布了请愿书, 预示了一次博物馆定义讨论的“重大分歧”。2019年9月7日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5届大会上, 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在内的24个国家分支机构以及5个博物馆国际委员会, 经过4个小时讨论, 三分之二的意见对提议的新定义持否定态度。多数建议将投票推迟了一年。然而, 正如一句

荷兰谚语所言: 拖延就是取消。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国际博物馆协会仅对当前定义进行了小幅调整, 将博物馆定义为“非营利性机构”, 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 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 包括丹麦研究员杰特·桑达赫尔(Jette Sandahl)在内的一些人反对说: “它不适用于21世纪”, 并且没有回应当前对“文化民主”的要求。

桑达赫尔领导的委员会提出了新的百字定义, 将博物馆定义为“针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批判性/关键性/重要性对话的民主化、包容性和多声道空间”, 并补充说明: “(博物馆应)解决当今的冲突和挑战, 为社会妥善保存物件和标本, 为后代守护多种记忆, 保证所有人平等可及遗产的权利。”博物馆应是具有“参与性、透明性”, “与各种社区积极合作并为其建立伙伴关系”并“旨在为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 全球平等和地球福祉做出贡献”。

\* 2019年9月, 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5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 关于修改博物馆定义的提案未能通过。本文摘编了学者史蒂芬·英格斯曼对此次会议的讨论(刊于Museumpeil)和记者文森特·诺斯的报道(原标题What exactly is a museum? Icom comes to blow over new definition, 刊于The Art Newspaper, 2019年8月19日), 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国际博物馆学发展的历史, 以及博物馆定义未能通过的原因。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多位学界人士直接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国际博物馆协会法国国家委员会主席朱利叶特·拉乌尔·杜瓦尔（Juliette Raoul-Duval）迅速谴责了这一充满“意识形态”的宣言，称其“未经咨询国家分支机构便已发布”，并认为新定义是个玩笑。

《艺术论坛报》的创始人迪迪埃·赖克纳（Didier Rykner）说，他抨击桑达赫尔等人描述的奥威尔式新闻发言，用物件和标本代替艺术品。要求延迟投票的一些国家委员会表示：“定义应强调博物馆的功能及其与有形和无形遗产的关系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区别性特征”，并谴责桑达赫尔文件的“政治意味”。

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是20世纪70年代“新博物馆学”概念创始人之一。对于博物馆的新定义，他坦言对这种“意识形态性的序言”的“夸张语气”感到惊讶，因为这一概念没有将博物馆区分于文化中心、图书馆或实验室。

法国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的Francois Mairesse教授的反对则更为严重。他于6月从桑达赫尔领导的委员会辞职，并称提议“未反映两年多来的讨论”并且“定义是一个简洁而精准的语句，界定研究对象的特点，这不是一个定义，而是对流行价值的陈述，太过复杂且部分异常……对于大多数法国博物馆来说，这将是很困难的。卢浮宫按此定义，将被视为‘多声道空间’，后果可能很严重。”此外，Mairesse补充说：“该定义没有考虑到博物馆的种类繁多。仅设定一种类型的博物馆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投票破坏了一直支配着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共识，那将严重削弱该组织。”

显然，大多数人无法认同新定义。原因何在？3年前，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负责更新博物馆定义任务的“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常委会（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MDPP）”由桑达赫尔领导。她曾在哥德堡创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World Culture），该博物馆包括选自民族学博物馆和世界文化博物馆的众多重量级收藏。这些世界文化博物馆是非常

新近的发展。它们解决文化认同和多样性议题，受社会责任/担当议题的驱动。最近几十年来，（欧洲）民族志博物馆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1990年左右，他们意识到，必须彻底摆脱殖民时代的遗产概念，重新发明、表征（reinvent）自己。从以“第三方”的态度呈现他者的历史与文化——这种呈现却无法把他者的现实生活包括在内——到以参与者的角度关注人，关注文化，博物馆在诸如人权（UN）、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以及气候变化（IPCC）等世界宣言中，可发现一种新的合法性，一种新的博物馆学得以出现，由多声道（polyphony）、合作关系（partnership）、包容（inclusion）、社会责任/担当（social responsibility）、原始国博物馆知识和藏品共享（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collections with museums in countries of origin）等关键因素组成。这是惊人的、令人振奋的事态发展，笔者（史蒂芬·英格斯曼）也热情地参与其中。这些转型，十分有助于民族学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s）的发展。它们将再次成为自豪的、充满活力的机构，譬如最近布鲁塞尔附近的特尔菲伦（Tervuren）重新开放的中非皇家博物馆（或者说是维也纳世界博物馆）！

现在，来自博物馆世界这一部分的所有这些创新，突然都被载入新的博物馆定义。变化之大，之前所有调整都不值一提——永久性机构必须为民主化、包容性和多声道的空间让位，以就过去和未来进行批判性/关键性对话（并且“过去”“未来”均为复数形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这场争论可以解释为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或者拉丁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迈向更具包容性博物馆模式的争论。刚刚发明或重新发明定义的博物馆先锋者已更为大胆，试图使其美好愿景成为一个机构的通用标准。如此一来，博物馆定义变成一种行动、行为方式、路径。国际博物馆协会此举异常大胆，这不是我们博物馆定义所应适用的。新定义应为普适接受的内容，保持所有国际博物馆协会成员的相互依赖性。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执行理事会正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将MDPP的创新观念融合成为可被普遍接受的博物馆新定义，并且一定要避免另一场惨败。